

【特別報導】

我的父親高一生

高英明

家父高一生於民國前七年在阿里山鄉樂野村「基布鳥」出生，當時的祖父阿巴里在樂野村警察駐在所擔任巡查補的工作，因此家父從小倍受日本人的照顧。民國4年送往嘉義市日本公學校（現今嘉義市垂陽國小）就讀。在就學過程中，學業成績優良，於民國14年，保送台南師範學校就讀。民國19年畢業後，進鄉在達邦村教育所任教，兼任達邦村警察駐在所巡查，同年與家母結婚。

家父在台南師範學校受教育期間，與南台灣優秀青年共聚一堂，追求新的人生觀，此時他開始對音樂有了濃厚的興趣、表現該方面特有的才華。在校時期，因特殊的表現，每逢假期，都被賦予回部落協助達邦教育所的工作。民國16年間，有位俄國語言學者「聶甫斯基」（N. A. Nevskij）到鄒族部落從事田野採集，為期一個多月，家父協助及報導鄒族語，民國24年「聶甫斯基」出版《鄒族語典》，收錄並保留了極為珍貴的鄒語記錄，對現今母語教學設下基礎，這是家父為族群作的第一件重要的事。

民國34年日本戰敗投降，台灣由中國收回，在三民主義的領導前提下，為了全族的經濟發展，家父接任阿里山鄉第一任官派鄉長，著手計畫新美、茶山的開發，及族人的移民工作，並創立新美農場，為阿里山鄉地方自治財源而努力。進而成立集約農場，為此，家父向土地銀行貸款50萬元，推展鄒族農業、造林、畜牧業等工作。

民國38年國民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，給台灣政局投入新的變數，家父為了表現對政府的忠誠，率領鄒族致敬團到台北拜會中央級政府官員，希望政府提供阿里山鄉更多經濟上的支援，並以山地地區實施地方自治為訴求，也提供多項倡議各山地鄉自治的藍圖，但也帶給家父被冠於叛亂的罪名。

儘管如此，家父仍秉持落實族群發展的理念，雖然在獄中仍然念念不忘鄉中發展計畫的推動情形。民國43年4月17日當局以「匪諜罪」執行槍決。家父的死亡帶給家人不幸，也帶給全體原住民尋求發展的障礙。❖❖